

论李光耀的精英主义高等教育观

□张亚群

李光耀是新加坡精英政治的首倡者和实践者。作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博才多识的学者,他对于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见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精英主义高等教育观。

一、精英主义高等教育观的政治论特色

美国高等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把高等教育哲学划分为认识论与政治论两类学派。前者认为,高等教育目的在于探索高深学问,满足人类理性发展的需要,由此而形成理性主义高等教育观;后者则主张高等教育探讨和传授高深知识应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偏向于功利主义高等教育观。李光耀的高等教育观属于后一类型,具有政治论特色。

李光耀是从政治的角度审视高等教育的功能、目的、制度和发展战略等问题,精英主义理论成为他的高等教育观的思想基础。

精英主义理论源于传统儒家的“贤人政治”思想。李光耀一贯主张,新加坡必须实行任人唯贤的精英制度,使最富有才智、办事能力强的精英分子加入文官服务和参政治国的行列。这是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相一致的。^[1]这里的“精英分子”就是指那些天资聪颖并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

李光耀认为,人的表现,得看天赋和教养而定。其中天赋素质比教育和环境等因素更能决定能力表现。但是,群体的表现,却更多地要看训练和组织而定。因此,“每个新加坡人,不论他的天赋素质怎样,都应帮助他们,通过更好的训练和教育,发挥所长,这是很重要的。”^[2]

对教育功能的这一认识,使他特别重视教育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国家成功的要素之一就是培养良好素质的人民和一大批杰出人才。“把一个民族的天赋才能金字塔化,专门技能(经过训练的才能)金字塔的彻底程度,是决定有关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大小的重大因素。”^[3]“对新加坡人来说,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不论种族、宗教和语言,我们都必须让有天赋才能的年轻一辈,接受最高的教育,使他们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4]

必须建立精英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有效地辨认人民的才干,并加以充分训练,使之为国家和社会带来最多的利益。李光耀强调说:“一个社会的结构,特别是它的教育制度和它的行政组织,将决定能够在人生多早的阶段,多准确地人民当中辨认谁对哪一类工作具有天赋,以及如何给这种天赋最好的训练和发展”;“新加坡要怎样才能有效地辨认、训练和调动我国的人力,以带来最大的利益,就要由最高层的政府高级人员、部长和最高级的行政人员所具有的训练才干的素质来决定。”^[5]新加坡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使命就是要人民的各

张亚群/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厦门 361005)

种天赋发展成为专业技能,为国家栽培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工程师、经理人员、专业人员、行政人员、军人、警察、教师、美术家、音乐家、演员、体育教练、厨师和现代社会里的其他专门人员。

从政治论教育目的出发,李光耀十分重视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特殊作用。执政之初的 1962 年,他指出:“我们急需计划大大扩展我们的高等学府”,“这些计划有些很幸运是由私人及公共基金资助,但其它的计划则必须依赖有限的政府资源。”^[6]他不断增加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和人力、物力的投入。1980 年他总结建国经验时说:“我们提高表现水平的速度和效力,就要看我们在学校、师资和教育方面投下多少资金而定,而且也要看为了加强学校、工艺学院和大学的师资和资源,以及为了监督研究而从外国输入多少教师和资源而定。”^[7]

为了使政府的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益,李光耀强调国家必须加强对高等学校的行政管理以及对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计划指导。政府通过拨款、立法和行政手段,逐步将高等学校的人事大权和教育大权收归国家,建立起高等教育的国家集权管理模式。

李光耀提出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发展重点应放在科学和工艺教育方面。他批评英国殖民制度下的教育政策,偏重于文科、医科和法科,而对于实用科学的教导以及技术人员的训练没有充分给予注意。进入 80 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的升级转型,他更加重视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同时,他也开始意识到高等教育中通才教育的重要意义,提出大学要“栽培有教养的新加坡人。”

李光耀是一个重视实际的人。他说:“不管理论是多么合乎逻辑和具有吸引力,为什么要尝试去做那些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是行不通和不实际的事情呢?”^[8]他的精英主义高等教育观就是从治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精英主义高等教育观的基本要求

英国布鲁纳尔大学政治系主任莫里斯·柯根教授以政治学的观点,分析英国英才主义高等教育的一般特征,“要求依照英才主义的方式进行选择、否决、证实或扩展知识领域,以英才的标准决定教学人员的聘任,决定机构、教职工和学生的分层。”^[9]李光耀的精英主义高等教育观提出了相似的基本要求,就是追求“卓越”。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涵义。

首先,在教育对象上,主张通过考试手段选拔那些天赋素质较高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李光耀认为:“大学的入学标准,主要是以分数制度作根据。这是公平无私、不偏不倚的。”^[10]政府的职责就是制订完善的政策和措施,保证高等教育能够真正选拔和培养出优秀人才。不受限制的社会流动性,为全体人民设立共同学校,没有人因富有或家长的地位而享有特权,以及根据个人的表现作为颁发奖学金和升级的标准等措施,“这些都是避免阶级分层的因素。”^[11]每年在奖学金计划下,政府派出 100 名最优秀的学生到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大学去攻读学位,而这些人均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当然,高等学校还必须考虑学生的性向差异和能力特长,克服招生环节中只用电脑根据分数去决定学生专业去向的片面性,更好地发挥学生的天赋特长。^[12]

其次,从事高等教育的工作者,必须是杰出人才。李光耀认为,“要搞好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是教学人员的热忱,他们的专业能力以及各系主任的领导能力。”^[13]需要鼓励更多新加坡学者成为大学教师,并聘请世界各地优秀人才前来任教。他说:“如果没有外地出生的人才流入我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和初级学院担任教职员,我们就别想那么快速有效地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准和增加学生的入学人数了。”^[14]

第三,在政治思想素质和语言文化素质方面,则要求把群体利益放在首位,培养国家意识,通过双语教育,兼具东西方文化之长。李光耀认为,教育和训练新加坡人,学习技能和养成守

纪律的精神,至关重要。“新加坡出生和培养起来的人才,必须因家庭教养和学校教育而具有最大的献身精神,在感情上和新加坡紧密地连成一体。”^[15]

他指出,从中小学开始的双语教学应该延续到高等教育阶段。将使新加坡“所有的人民都有他们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语言作根基,而且也都有效地掌握英语,这是获取西方高深工艺知识的钥匙。”^[16]对于华人而言,“教导华文的最大价值是在于传播社会行为和道德行为的准则。这主要是要指儒家学说对做人、对社会以及对国家的思想与信念。”^[17]

第四,在专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要求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传授最新的研究成果,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新加坡派出了最优秀的官员到美国和欧洲的商学院及国际组织,去培养和更新知识。李光耀要求改革落后的教育方法,更好地发挥教育的育人功能。认为,千百年来科举制度曾有系统地罗致最优秀的读书人,使他们循规蹈矩和愿意服从,但付出的代价却是“使过去帝制的中国被摒弃于西方伟大科学工艺发明和工业革命的门外”。“知识,尤其重要的是好奇心与怀疑精神的培育,是革新的动力,它使以科学作为基础的工业得以成长。”^[18]

第五,在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和发展规模上,要求达到提高教育质量与发展学生数量的和谐统一。1970年,李光耀在比较香港与新加坡的教育制度时说:“许多新兴国家的大学,一般倾向是把考试及格水准越降越低,造成大学过分拥挤的现象”,而香港和新加坡的大学却未出现这种状况,“也许我们对于维持学术水准,彼此都具有同样的决心。”^[19]1980年,他则指出,过去压低大学生人数是不明智的,如果10年前放松的话,今天就可能多二、三千名新大毕业生,而减少两万张就业准证。必须通过聘请更多的及资格更好的教师,从而训练出更多更好的毕业生。“一所大学的声誉,固然要靠教授的学问素养,但同时也得靠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学术上的表现。”^[20]李光耀主张把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学术文化中心,广泛接受东南亚各国学生前来深造。

第六,在人才使用上,要求制定完备的政策法规,保证专业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中自由流动,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李光耀认为,“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往往决定于国家基本单位人员的素质、力量和眼光。”^[21]他肯定古代中国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认为通过公开考试从大学毕业生中征聘和录用国家公务员,能够有效地防止行政用人中的人治弊端,创造良好的政治文化。他主张“使有才干的人获得足够的报酬,以奖赏他们对我国的总体进展所作出的贡献。”^[22]

如果说,引进外国教师、互派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文化,培养合乎国际质量标准的人才等内容是属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那么,有关政治思想素质和语言文化素质方面的内容则是本国化的要求。高等教育如果没有本国化作为基础,那么其国际化也是难以真正发挥作用的。李光耀的精英主义高等教育观,体现了高等教育本国化与国际化的统一。

三、精英主义高等教育观的重要影响

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30余年,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他的精英主义高等教育观产生了巨大影响。积极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导致新加坡形成一套具有本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

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高等教育完全移植了英国模式,实行大学自治,重学术轻技艺;独立后,新加坡实行教育分流,从小学到大学分成学术和工艺两个源流,一改昔日重学轻术的传统。同时,政府加强控制,逐渐形成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这和战后香港的大学自治体制恰成鲜明对比。此外,鼓励政府投资,使新加坡高等教育走上了以公立为主体的发展道路。这

与一些以私立高等教育为主的国家如菲律宾存在明显差异。新加坡和菲律宾同为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却大相径庭,精英主义高等教育观的影响或许是重要因素之一。

其二,促进新加坡高等教育培养大批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需要的专门人才。

新加坡高等教育既重视培育学术精英人才,又根据个人的特长训练技艺型专业人才,力求使人人成为有用之才。李光耀指出:“尽管制度有许多缺点,我们还是训练了一些很优秀的专才,有些能够跟世界优秀的专才媲美。”^[23]更为重要的是,高等教育依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培养人才,不盲目扩大数量,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人才资源结构失调和人才过剩的问题。高校毕业生能够充分就业。专家、技术人员、管理工作、行政人员的就业比例显著上升。据统计,其比例 1957 年为 6.8%,1970 年为 10.3%,1980 年为 18.3%,1990 年达 24.2%。^[24]

其三,促进新加坡人好学上进之风的形成,为社会迈向更高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精英主义高等教育观转化为政府的教育发展政策措施后,逐渐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使新加坡坚信:“教育和学业成就,能为个人、家庭和国家带来好处”;“要培养子女,就要让他们接受训练、训导和教育。”^[25]新加坡家庭把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当作头等大事。正如所说的那样:“新加坡人现在似乎不只要有学位要有文凭,而且最好是学位不止一个,文凭不止一张,要不然,就是被认为没有前途了。这的确是 90 年代新加坡人的普遍想法。这一想法也激励着新加坡人始终向前发展,鼓励他们永远力争上游,不落人后。”^[26]对此,李光耀给予高度评价:“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这种珍惜学问和相信知识能改进个人前途的强烈信念,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一个成功的社会,必须有受过良好教育,终身不断学习的人民。”^[27]

在肯定精英主义高等教育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它对于新加坡人的功利主义倾向和人才外流问题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国家和个人把高等教育作为达到功利目的的手段,追求功效至上。学校升学竞争十分激烈,学生身心负担加重。人际关系趋于紧张与冷淡,对物质享受的热衷超过了对精神享受的追求。社会正面临着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

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又为人才外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凡此种种已引起政府对本国人才发展战略的反思。

自 80 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在双语教育政策的执行上,纠正过于重视英语的偏差,加强母语教育。90 年代以后,开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举办华语华文教学与研究,使华文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阶段衔接起来。

在教学指导思想和课程设置上,开始重视通才教育,加强基础课教学,增加非专业性的选修课程,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以增强“应变能力”。^[28]同时,加强东方价值观教育,如义安工艺学院以五大东方价值观,即敬老、自律、勤奋、正直与责任作为学生的院训。促使新加坡高等教育培养具有坚定爱国意识、更加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

参考文献

[1][25][27]李光耀《在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仪式上的致词》·《光明日报》·1994 年 10 月 16 日

[2][3][4][5][6][7][8][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 40 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6 年版

[9]王承绪等编译·伯顿·克拉克等著·《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第 73 页

[24]曹云华《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18 页

[26](新)余长年《教育是新加坡人的第一件大事》·第 301~302 页

[28]潘懋元、黄建如编著·《新加坡国立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15 页